

洪水效應：台灣的語言戰爭

Flood Effect in Language Wars in Taiwan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洪惟仁

uijin@ms3.ntcu.edu.tw

uijinang@gmail.com

摘要：語言地理學的研究最重要的最終目的是要對語言分佈提出所以然的解釋，語言地理學於不同範疇有不同的理論。本論文討論語言分佈狀態的發展論，這個理論針對語言、方言地理分佈的發展過程進行類型分析。本文主張語言分佈的發展有兩種類型：插入型與包抄型。但兩種類型構成一個連續體，插入型優勢語言往往發展為包抄型。本文並主張推斷語言的新舊往往不能根據語言分佈的表面狀態，必須根據歷史事實。

1. 語言分佈的解釋

語言地圖的繪製是語言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之一。並不是說一定要繪製地圖才算是語言地理學研究，只能說地圖繪製是呈現語言地理學研究成果的最好手段；但是語言地圖畫出來了，也還不能說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就算大功告成了。

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的最終目的是針對語言分佈提出所以然的解釋，並歸納出概括化的、普遍性的原理、原則。

Chomsky(1964)提出語法研究的「三層次的妥當性」(three levels of adequacy)理論。運用到語言地理學來，三個層次可以對應如下：

一、觀察的妥當性：對於個別的地區，能夠正確觀察，得知語言或方言的分佈狀態。

如熟悉當地語言現狀的受訪者之所知，只能說達到了「觀察的妥當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

二、描寫的妥當性：能夠根據正確的觀察或調查資料，把語言或方言分佈的實況加以正確的描述，繪出精確的地圖。如語言地理學家之整理、比較、分析、歸納、地圖繪製等工作，可以說達到了「描寫的妥當性」(descriptive adequacy)；

三、解釋的妥當性：能夠運用語言地理學的普遍性原理，歷史發展的史實，解釋語言或方言所以如此分佈的成因、發展過程，才可以算是達到了「解釋的妥當性」(explanatory adequacy)。

1.1 語言分佈解釋的兩個取向

語言地理學家有關語言空間分佈的解釋可以有兩種研究取向：

- 一、從語言分佈的表面狀態進行語言地理學的分析；
- 二、與地理學、歷史學進行跨領域研究，解釋語言分佈狀態之所以然。

語言空間分佈的變化可能出於語言本身的動機(motivation)，其發展模式可以靠著語言學本身的理論來證明。譬如台灣閩南語現在有幾個正在發生的音變(phonological change in progress)，如央元音崩潰，變成普通元音；j-/ [dz/z]併入l-/ [d/l]，由海口的泉腔區向其他地區擴散(參見洪惟仁 2003 a, b)。這些方言形式的變化與空間擴散，不一定要求證於語言外的解釋。

但是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語言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語言空間分佈的擴散與消長往往無法擺脫自然地理、社會發展、政治事件、族群遷徙、人口變動等因素對語言發生的影響。當代的語言分佈狀態必然是過去民族接觸或民眾交往所產生的語言互動的結果。因此共時的語言分佈狀態其實是語言史的縮影，語言分佈的解釋，說穿了就是語言史的重建。因此語言地理學的解釋必須和地理學、歷史學合作進行跨領域研究。

總之，語言地理學理論基本上只有「洞識力」而沒有「證明力」。因此語言分佈的解釋除了語言地理學的普遍原理之外，必須與地理學、歷史學乃至社會學、民俗學進行跨領域研究。

1.2 傳統語言地理學的範疇

傳統語言地理學有四個重要的範疇，包括：(1)類型論：討論語言的分佈類型；(2)發展論：討論語言分佈的發展型態；(3)生成論：討論語言分佈形成的過程與動因；(4)

原鄉論：討論如何判定語言擴散的起點。

本文把焦點放在「發展論」的討論。這個理論研究語言地理分佈開始變化之後發展的過程及其發展類型。本文把語言地理分佈的發展分為兩種類型：插入型和包抄型。

1.3 語言連續性原則

如前所述，語言地理學研究不能只做到描寫性分析，還要進一步歸納出解釋性的原理。語言分佈的解釋雖然不能脫離地理條件與歷史文獻印證，但是語言地理學本身有獨立的一套理論，可以對語言分佈的表面進行語言地理學的分析。

日本柴田武《言語地理学の方法》（1969）提出「語言的地理分佈」兩個原則：連接分佈原則與周邊分佈原則。第一個原則相當於本文所謂的「語言連續性」原則。本文所謂的「語言連續性」原則不只用在語言地理學，也用在所有的語言變異或變化，可以說是語言變體分佈的基本原則，這是本文之所以採用「語言連續性」原則，而不延用柴田先生創用的名稱的原因。

所謂「語言連續性」是認為語言或方言變體的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都具有「連續性」（continuity）。不論是語言自然的歷史變化、地理變異或社會變異，所有變體在歷史上、社會上、地理上的常態分佈都排列成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因此所有語言的變異必然形成「漸層分佈」（gradient distribution）狀態，語言的變化也必然呈現「漸層擴散」（gradient diffusion）。¹運用到語言地理學，所謂「連續性」包含兩個概念，其一是柴田先生所謂的「鄰接分佈」，其二即「漸層分佈」。

雖然如此，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往往破壞了常態分佈，否則語言的地理分佈就永遠是固定不變了。當語言地盤發生變化，語言的分佈狀態的連續性受到破壞時，就會顯得「奇特」，而引起語言學家的興趣，試圖提出解釋，解答為什麼分佈的狀態會不合常態，因而產生一些變異理論。

語言所以發生不連續分佈現象，不論是在社會階層上的分佈或是地理空間上的分佈都暗示著有個故事發生了。社會語言學家或語言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去解開這個歷史的秘密，判斷語言的不連續分佈或不規則分佈是因為語言本身的變化或語言發生了競爭，抑或是政治事件或人口移動所造成的結果，而其發展的過程有什麼類型。

¹ 這是在我的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所闡述的理論（洪惟仁 2003，第 11.3 節）。雖然這個理論並不新鮮，可以說是語言學的共識，只是現代語言學界已經很少人討論了。

2. 語言分佈的兩種發展類型

「發展論」討論語言分佈發展的型態。本文分為「插入型」與「包抄型」進行討論。

2.2 插入型的發展模式

日本柳田國男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論」(見柳田國男, 1930), 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 也就是說語言的地理方言變異, 周邊一致性的變體是存古的, 中間不一致的變體是後來插入的新形式。柳田假定有三個連續的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假定這三個聚落屬於同一個語言或方言, 其語言變體的分佈應該成這樣的狀態:

a — a — a

三個聚落的方言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成連續性分佈。柴田武(1969)進一步假定分佈成:

a — b — c 或 c — b — a

表示距離越遠, 方言差異越大, 也合乎「鄰接原則」, 並沒有違反前述的「語言連續性原則」²。但是如果方言變體形成這樣的分佈狀態:

a — b — a

周邊方言一致, 而中間的方言不一樣。這樣的非常態分佈狀態就違反了語言連續性原則了, 如上所述, 這裡面一定有一個故事在。柳田國男為了解釋這種奇特的分佈狀態, 提出所謂的「方言周圈論」。主張可以推斷 B 聚落的 b 方言是後來插入的新變體。柴田武(1969:32)接受了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 作為他語言分佈理論的第二原則「周邊分佈原則」。

日本學界把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看成是日本方言地理學對語言地理學的理論貢獻。不過如下節所述, 這個理論並不能解釋所有的現象, 並且也不是柳田國男的獨創。

約和柳田國男發表「方言周圈論」(1930)的同時, Bloomfield 在 *Language* (1933) 一書也提出類似的理論。【附圖 1】是荷蘭德語「鼠」和「屋」的韻母變體分佈。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德語的[-uɪs]韻進入荷蘭之後慢慢變成 [-uɪs]/[-yɪs]的混合, 呈現了漸層分佈狀態, 接著往西變成[-yɪs], 再進一步變成[-ɪs] (分佈在 Bruges 附近)。這些變體雖然形式有異, 但都是圓唇長單元音, 元音的舌位變化也隨著漸變的軌跡, 由後→前, 由高→中, 成

² 柴田武(1969:27-31)有關語言地理分佈的第一原則「鄰接分佈原則」假定詞彙延著地面傳播, 詞彙變體基本上必須遵守「鄰接原則」分佈, 不是 a-b-c 就是 c-b-a。而中間的 b 往往是 a 和 c 的混合。這樣的分佈狀態, 用本文的說法就是「漸層分佈」的狀態。

【附圖1】「荷蘭語『鼠』和『屋』的韻母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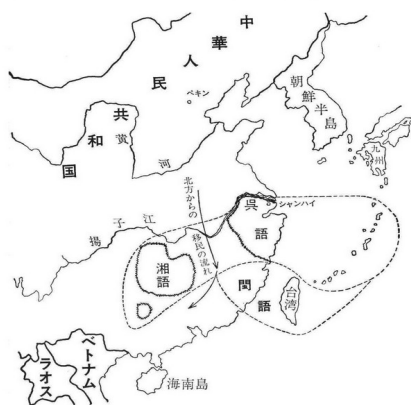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第十九章插圖

漸層變化狀態，並不違反連續性原則。但是請注意，荷蘭內部穿插著一個雙元音的[-ɥs]的分佈區，荷蘭最大城市的 Amsterdam、Hague 就在這個區內，可見這個變體的競爭力相當強勁。Bloomfield 指出，中心地帶的[-ɥs]雙元音變體其實是新發展的分佈區，屬於「插入型」的發展模式。

他的論述雖然沒有「方言周圈論」的術語，不過所見略同，發表的時間也約在同時，應該沒有互相參考而是同時創發的。

橋本萬太郎(1981:345-352)指出日本奄美、沖繩一帶周邊方言聲母有 t, th, d 三元對立，中央地帶只有二元對立，那是因為中國移民的影響；中國的湘語和吳語的聲母有三元對立(全清、次清、全濁)，中央地帶的贛語、客語、粵語只有二元對立，沒有全濁音。其分佈大勢如【附圖2】所示。

【附圖2】橋本萬太郎「三維對立的地理擴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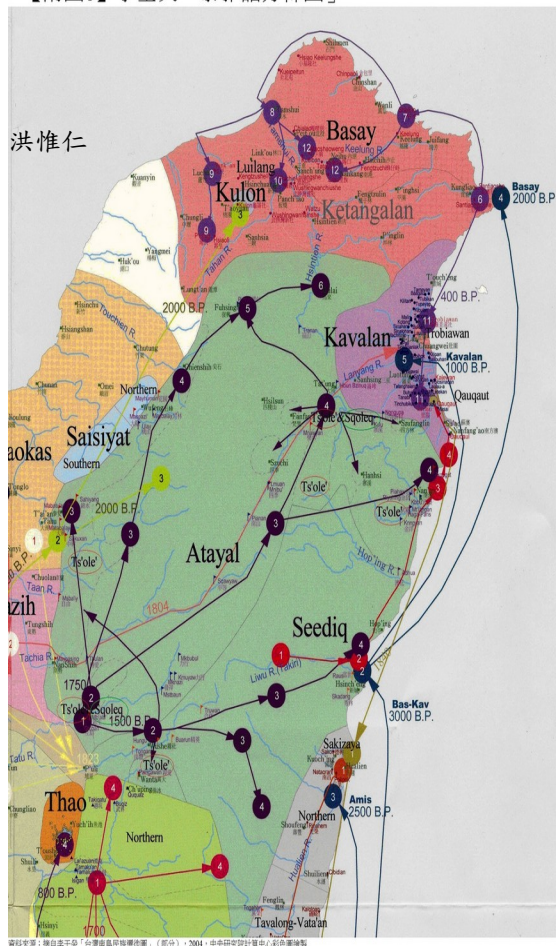


第55圖 3項對立的地理的ひろがり

資料來源：橋本萬太郎《現代語言學》(1981:350)

橋本解釋說這種二元對立的新形式是因為北方移民南遷，沖破了南方三元對立聲母的地理分佈連續體所造成的新局面。

台灣南島語的泰雅族 (Atayal) 原居今仁愛鄉北部山區，大約兩百年前才紛紛由南投縣仁愛鄉附近開始向北遷徙 (參見移川子之藏等 1935；馬淵東一 1954；李壬癸 1997、1999)，然後遍佈整個北部的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泰雅語有兩種主要的方言：Ts'oli'和 Squliq。Ts'oli'方言分佈在五峰鄉西部、泰安鄉、仁愛鄉北部山地以及南澳鄉、大同鄉的四季村，相當於泰雅語分佈區的邊緣地帶，而中心地帶的新竹縣尖石鄉、台北縣烏來鄉、宜蘭縣大同鄉等都是 Squliq 方言的分佈區。由整個泰雅語方言的分佈大勢來看，Squliq 被 Ts'ole'所包圍，而 Ts'ole'方言的分佈區失去了連續性。右圖【附圖3】顯示泰雅語分佈在同語系的賽德克 (Seediq) 語的北部，Ts'ole'方言分佈在泰雅語東西周邊。



李壬癸據此分佈狀態，推斷 Ts'oli' 人北遷比 Squliq 人早。李壬癸指出：「……泰雅語群最分歧的區域集中在南投縣仁愛鄉。……可以推測，這個語群最先在仁愛鄉內開始分化與擴散。這個推測正好和本族人的傳說：起源於仁愛鄉發祥村（舊稱瑞岩）一致。」（李壬癸，1997：94）又說：「大約十八世紀中葉，泰雅族從現代分佈的西南端（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一波一波地向北和向東遷徙。……向北擴散的泰雅再進一步分裂為澤敖列（Ts'oli'）和賽考力克（Squliq）。前者遷徙的時代較早，而且大都分布在邊緣地區，而後者的遷移是相當晚近的事，其地理分佈最廣。」（李壬癸，1999：35）至於遷入宜蘭的時間，大約 1754 年左右 Ts'oli' 人先遷入；大約 1820 至 1850 年 Squliq 人才遷入。（李壬癸，1996：192）

以上分析的語言分佈狀態都可以印證「方言周圍論」的要旨：周邊一致性的方言是舊的，中間插入的方言是新的。

問題是「方言周圍論」是普遍性的原則嗎？如果是，那麼根據這個理論，任何語言或方言呈現 a-b-a 的分佈型式，a 一定是原本的語言或語言形式，b 一定是新發展的或插入的語言或語言形式了。

不過，這個假設一旦出現了一個反例，它就不是普遍性的「原則」，只是語言地理分佈發展的一種類型。從而所謂「方言周圍論」必須歸入「插入型」的發展模式，而其相反的模式為「包抄型」。

2.3 包抄型的發展模式

Bloomfield 在 *Language* (1933) 舉出一個東歐發生的包抄型發展模式。右圖【附圖 4】「東歐拉丁語分裂圖」顯示屬於拉丁語系的羅馬尼亞孤立於拉丁語系的分佈區之外，和意大利之間發生斷裂，而被芬匈語系的匈牙利語以及波蘭、俄羅斯、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的斯拉夫語系語言所包圍。

從羅馬尼亞的地理位置來觀察，按照「方言周圍論」所主張的「古語殘存於邊境」的解釋，羅馬尼亞應該是插入的新興語言才對。可是 Bloomfield 根據史實說拉丁語系的語

言本來是連續相接的，因為中世紀斯拉夫語的入侵，接著，九世紀匈牙利語的入侵，才造成羅馬尼亞和拉丁語系的分佈區斷裂。總之，從羅馬尼亞與斯拉夫語系的關係而言，並不屬於「插入型」，而是一種「包抄型」的發展模式。換言之，分佈在周邊的語言不是「古語」而是「新語」。

由這個例子來看，Bloomfield 的解釋和柳田的「方言周圍論」顯然是互相衝突的，如果 Bloomfield 是正確的，「方言周圍論」便無法成立。

3. 洪水效應：由插入到包抄

語言分佈「形成論」討論新興的語言或方言變體如何擴散、擴張等語言分佈區變動的成因。語言的分佈狀態可以分為「點狀」和「片狀」兩種。(詳參項夢冰、曹暉, 2005:)這兩種分佈型態有不同的成因。點狀分佈是語言使用者或語言形式向遠隔的新天地散佈所形成;片狀分佈是語言使用者或語言形式向鄰接的周邊擴散所形成,點狀分佈有可能發展為片狀分佈,而其基本條件是語言接觸

3.1 語言接觸：競爭或戰爭

兩種語言如果在地理上互相隔絕，不同的民族間沒有戰爭，語言也不接觸，則語言之間不會發生競爭，語言地盤會保存在一個穩定的狀態，相安無事。

但是當語言互相接觸，一定會發生競爭，競爭的結果，語言的勢力會分出高下，然後語言地盤開始發生變動。強勢語言的地盤越來越擴張，弱勢語言越來越萎縮，最後走向消亡的命運，成了強勢語言大一統的局面。這樣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競爭，其實已經不能叫做「語言競爭」（language compitition），而是「語言戰爭」（language war）了。我在拙文〈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洪惟仁 1995）中就是這樣稱呼的。所謂「洪水效應」（flood effect）指的是這種激烈的「語言戰爭」。

三、四百年來的台灣史上，曾經發生了幾次的語言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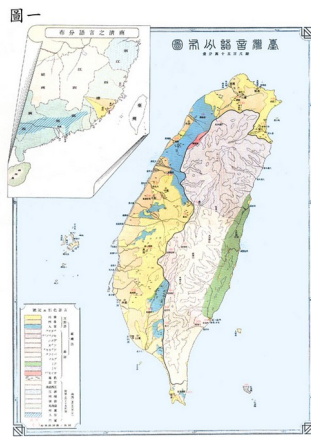
【附圖4】Bloomfield「東歐拉丁語分裂圖」



資料來源：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第十八章插圖

3.1.1 第一次：漢南戰爭

上引拙著(洪惟仁 1995)提到,第一次是漢語和南島語的戰爭。清代的台灣,使用南島語的原住民被分為「熟番」與「生番」。所謂「熟番」就是接受清朝統治,接納漢人、接受漢文化的南島民族;反之,「生番」是不接受清朝統治,不接納漢族,不接受漢文化的南島民族。漢番之間有一條「番界」,這條番界隔絕了漢番之間的語言接觸,也造成日後「生番」和「熟番」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



經過兩百多年熟番與漢人之間頻繁的接觸,語言戰爭的結果,熟番被漢人同化掉了,原本遍佈平原及淺山的熟番原分佈區,消失殆盡了。【附圖5】「臺灣言語分布圖」(小川尙義 1907)顯示,到了日治初期,漢語,包括漳州、泉州的閩南語和所謂「客人」的客語,像洪水一樣淹沒了整個台灣的平原及淺山地帶,區內只剩稀疏散佈的「番社」(熟番的部落,用橫黑條標示),儼然如洪水中突出水面的大樹、高樓或山丘。

可是發展到現代,所有熟番的語言島全部消失,被漢語淹沒了。像這樣的語言競爭已經不能用「競爭」來描寫,必須用「戰爭」來描寫,而語言戰爭的過程也不能用「波傳」來描寫,必須用「洪水氾濫」來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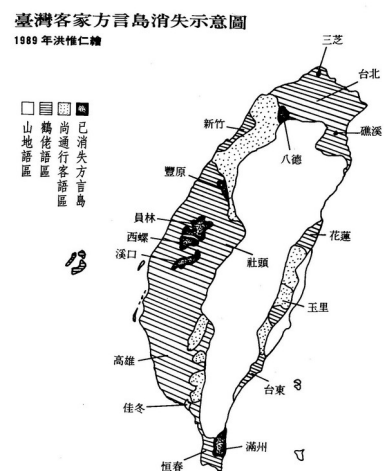
相對的,深山地帶的「生番」,因為清代乃至日治時代漢番之間的種族隔離,語言沒有機會接觸,其南島語沒有被漢語侵蝕,直到二次戰後仍保存完好。可見,「不接觸」是弱勢語言免於在語言戰爭中失地滅族的條件之一。

3.1.2 第二次：閩客語言戰爭

閩南語和客語聯手入侵台灣,在漢語與南島語的語言戰役中可謂同屬一個「共犯結構」,但是閩南語與客語之間也發生了戰爭。

客語的分佈有兩種狀態,一種是閩、客分地而居,客家人聚居在一個相當大的地盤,成片狀分佈,由桃園南部、新竹、苗栗、台中等縣的丘陵、台地一直延續到南投的國姓鄉的丘陵地帶。至今客語在這個區域還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固狀態,雖然也顯示萎縮的趨勢,但在台灣西北海岸地帶也有少數閩南人被同化為客家;另一種是客語成群島或孤島狀態散佈。最大的客語群島分

【附圖6】



佈在高屏地區，這個地區因為主要是四縣客家，島與島之間有強固的聯盟，叫做「六堆」，因此雖然被包圍在閩南語區之中，分佈區內的客語至今仍然相當穩固。

除此之外，散佈在閩南語區內大大小小的客語島全部受到閩南語的包抄，一個一個消失了，目前只剩雲林縣北部崙背鄉東南部、二崙鄉西南部還在苟延殘喘，但年輕人逐漸改說閩南語或華語。這個客語島正面臨消失的危機。[右圖【附圖 6】「台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引自洪惟仁 1992 卷末附圖）黑色塊點標示的是在閩客語言戰爭中被閩南語同化而消失的語言島。³

3.1.3 第三次：日台語言戰爭

第三次是日語與台灣諸語言的戰爭。日治時期日語叫做「國語」，日語不但是標準語，也是各族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經過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大部分原住民部落仍然完好地保存著族語，唯一的例外是方言複雜的宜蘭縣澳花、東岳、寒溪等泰雅族部落，喪失了泰雅語，居民日常改用一種日語和泰雅語混合的「客里謳」（*creole*），政治上叫做「寒溪泰雅語」，其實其基礎是日語。這是日、台語言戰爭所「插入」的新語言島。

3.1.4 第三第四次：華台語言戰爭

第四次是華語和台灣語諸言的戰爭。二次戰後的蔣家時期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獨尊華語，壓迫本土語言的政策，包括閩南語、客語以及原住民南島語的所有本土語言都受到很大的生存威脅。這個華台語言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預料其結果，將使台灣語言地圖變色。

相對的，深山地帶的「生番」，因為清代乃至日治時代漢番之間的種族隔離，語言沒有機會接觸，其南島語沒有被漢語侵蝕，直到二次戰後仍保存完好。可見，「不接觸」是弱勢語言免於在語言戰爭中失地滅族的條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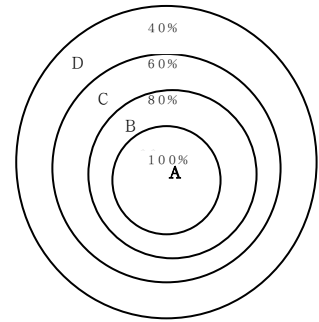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所謂「生番」雖然沒有被閩南語或客語淹沒而消失，但由於日治末期台灣總督府的強勢統治，南島語的隔離狀態開始受到受到破壞，更嚴重的是戰後國民政府的山地開發與開放，漢人大量入侵山地，加上蔣家時期過度的國語教育，造成原住民族語消失相當嚴重。可以預料，這個漢原語言戰爭不會停止，只會加速進行，在可見的將來，南島語分佈區將完全被漢語淹沒而消失。

³ 比較【附圖 1】「臺灣言語分布圖」（小川尚義 1907）和【附圖 6】「台灣漢語方言分佈圖」（洪惟仁 2009）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在閩南語區內的客家語言島消失的情形。我把這個消失的過程繪製成右圖所示的「台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參見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所附）。

3.2 語言傳播：波傳或洪水

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1872 年提出一個有名的「波傳論」（wave theory/ wallentheorie），這個理論認為新形成的變體由一個點開始向周圍擴散，其過程可以比喻成投石於水，水波由落石點向外擴散，形成同心圓狀的水波。這個理論方便說明「插入型」模式發展的過程。柳田的「方言周圈論」可能就是由「波傳論」的啟發發展出來的理論。但是「波傳論」不止能夠解釋「插入型」，也能夠解釋「包抄型」的發展。

「波傳論」討論的是語言的競爭過程中，新興的語言或語言形式向外傳播。如右圖【附圖 7】「施密特的波浪模型」（李仲民繪製，引自李仲民博士論文 2009: 2008）所示，新興的形式由中心的 A 向周邊 B→C→D 的方向擴散。



【附圖 7】

把語言特徵的傳播看成水波只是一種比喻，這種比喻比較溫和，可以解釋語言特徵或詞彙的地理擴散，但不能描寫激烈的語言戰爭。

語言的戰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其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力道好比洪水氾濫，絕對不是「波傳論」的波浪所能形容。筆者把語言殘酷的戰爭所引起的語言地盤的變動類型用「洪水論」（flood theory）的「洪水」來描寫。

現在把連續性的原始語言分佈狀態看成是地面，新興的語言或新形式看成是大雨之後的洪水。當大雨滂沱、山洪爆發的時候，地面上洪水氾濫了，橋斷了、路不通了，低窪地淹沒了。就洪水造成陸地的斷裂而言，這是一種「插入型」的初期發展階段。上舉荷蘭中部的雙元音的形成便是。

如果洪水繼續暴漲，淹沒面積慢慢擴大，沒有淹水的高地越來越小，然後一個一個的高地變成一個一個的孤島。這樣，先前「插入型」的山洪至此變成了「包抄型」的洪水。前述的閩南語包抄客語，以及漢語包抄南島語都是「洪水效應」的實例。

3.3 由插入型到包抄型的發展

文末【附圖 8】「台灣語言分佈圖」顯示，台灣的原住民南島語大部分分佈在中央山脈的高山地帶以及東部海岸山脈兩邊（阿美族）及蘭嶼島（達悟族或稱雅美族）。除達悟族所居住的蘭嶼不論，地圖顯示，整個台灣島上的南島語分佈區全部被包圍在漢語分佈區內。

從共時的表面分佈狀態來看，南島語分佈在中央而周邊，按照「方言周圈論」，可以推斷南島語是新插入的，而漢語才是原住民族。不過事實剛好相反。

眾所周知，十七世紀初期漢人開始入侵台灣以前，台灣全島是南島語的分佈區。漢人移墾台灣的初期階段，漢語的分佈還處在「插入型」的階段。漢人移墾台灣雖然從台南開始，但不是單點插入，而是紛紛由西部港口多點入侵。隨著漢人地盤不斷擴張，點連成面。【附圖 9】「乾隆初葉番界圖」（根據柯志明 2001 重繪，地圖為台灣現代語言分佈大勢）乾隆十五年及二十五年所劃訂的「番界」，番界以西是漢語區，番界以東是南島語區，顯示到了乾隆時代，台灣的半壁江山已經被漢人所佔據了。

到了清末，整個西部和宜蘭已經全部被漢人所侵佔，東部花東地區也在漢人掌握之中。【附圖 405】「臺灣言語分布圖」（小川尙義 1907）顯示日本佔領台灣初期，宜蘭已經淪為漢人分佈區，但東部花東地帶還還是阿美族南島語的勢力範圍。但漢人的分布區再繼續擴張，【附圖 4410】「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引自小川尙義 1935）顯示到了日治時期中葉，東海岸花東地區已經全部被標示為漢語優勢區，阿美族和其他的平埔族一樣都只用部落符號標示其存在。如【附圖 8】所示現在花東地區的語言分佈錯綜複雜，阿美族及雅美族其實還有很穩定的分佈範圍，小川尙義（1935）的標示不免有一點過分，不過可以解讀為當時花東地區的漢語勢力已經控制了整個花東地區，阿美族及雅美族變成主要語言了。

經過日治時代及戰後的東部開發，除了孤懸太平洋上的蘭嶼達悟語之外，台灣本島所有平地和淺山地帶全部被漢人佔住了。如【附圖 8】所示，原住民被包圍在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的高山地帶之中，並且侵入花東縱谷，幾乎把阿美族完全包圍在海岸山脈兩岸而構成另一種小型的包抄。

換言之，現在南島語在台灣的分佈狀態是因為漢人插入、擴張的結果。問題是：分佈在「周圍」的漢語是**中新**插入的，被包圍在中央的才是原住民語言，這種發展類型顯然違反了「語言周圍論」所謂「古語在周圍」的推論。

再看客語的分佈狀態。客家人最集中的桃竹苗客語區西大半被包圍閩南語區之中，而東臨廣大的南島語區，由東西向來看，構成了 a-b-c 的連續性；但從南北向來看，卻顯示 a-b-a 的分佈狀態。至於雲林縣崙背、二崙地區的詔安客語區及屏東六堆的客語群島，完全被包圍在閩南語區之中，構成 a-b-a 的分佈狀態。然而這也自有歷史的原因，客語因為人口劣勢，沒有能力包抄閩南，只有被包抄的份，但是沒有辦法簡單地證明中央的客語是後來插入的。

4. 結論

地圖繪製是呈現語言地理學研究成果的最好手段，但語言地理學最重要的是能夠為

語言分佈狀態提出解釋。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兩種取向：

- 一、從語言分佈的表面狀態進行語言地理學的分析；
- 二、與地理學與歷史學進行跨領域研究，解釋語言分佈狀態之所以然。

傳統語言地理學有幾個重要的理論。這些理論可以分爲：(1)類型論：討論語言的分佈類型；(2)發展論：討論語言分佈的發展型態；(3)生成論：討論語言分佈形成的過程與動因；(4)原鄉論：討論如何判定語言擴散的起點。本文由「發展論」談起，但把焦點放在「形成論」。

本文把語言分佈區的發展分爲兩種類型：「插入型」和「包抄型」。

語言的分佈狀態可以分爲「點狀」和「片狀」兩種。語言分佈區的形成之初，插入到別的語言島是點狀的，但後來經過語言競爭，逐漸發展、擴張了地盤，變成片狀的，進一步旋轉局勢，變成包抄原住民的語言。而其基本條件是語言接觸，語言接觸演變成語言地盤的爭奪，我們把這種情形叫做「語言戰爭」。

台灣的漢語最初是由台南「插入」台灣南島語分佈區，在這個階段屬於「插入型」的發展階段；但是漢語繼續擴散，由南而北，由西而東，最後淹沒了整個台灣的平地。如【附圖 8】所示，目前南島語在本島只剩兩塊連續性的分佈區：高山地帶、花東海岸山脈。這是由「插入型」演變爲「包抄型」的典型例子。

由此可見，所謂「插入型」、「包抄型」是語言分佈區發展的兩種模式，「插入型」與「包抄型」不是互相對立的類型，寧可說是一種連續體。並且屬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本文把這種發展過程叫做「洪水效應」。「插入型」的語言如果夠強勢，可能逐漸擴張，演變而爲「包抄型」，如台灣三個世紀前新插入的漢語，經過長期的語言競爭，擴張了地盤，包抄了南島語。事實上，經過台灣第三次日台語言戰爭，宜蘭地區已經插入了日語客里謳；第四次語言戰爭之後，南島語區已經開始破碎了，如【附圖 8】所示區內已經出現了一些漢語的語言島，有華語島、閩南語島，也有客語島，這些戰後才插入的語言島的確合乎「方言周圈論」的原則，但是這些語言島繼續發展下去，經過一場語言戰爭，將來演變成「包抄型」的語言卻是很有可能的，而華語即是其中最有可能的語言。

參考書目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eprinted in 1962.

Brewer, Warren A. (卜溫仁)

2008, *Mapping Taiwanese*. 南港：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Dauzat Albert 原著、松元秀治譯

1938, 《言語地理学入門》，東京：富山房。

David Crystal 原著、風間喜代三、長谷川欣佑譯

1992, 《言語學百科事典・言語及其特徵・地理特徵》pp.33~50, 東京：大修館書店。

Eugenio Coseriu 原著、柴田武、賀登崧共譯

1984, 《言語地理学入門》，東京：三修社。

Grotaers, W. A.

1994, 《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岩田禮日譯，好文出版。

2003, 《漢語方言地理學》，石汝杰、岩田禮中譯，上海教育出版社。

Labov, William, Sharon Ash and Charles Boberg.

2006. *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A Multimedia Reference Tool*.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Weinreich, Uriel.

1954, Is a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possible? *Word* 10:388-400, Reprinted in J. Fishman. (ed.) 1968.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Hague: Moulton.

小川尙義主編

1907, 〈日台大辭典緒言〉載《日台大辭典》，台灣總督府。

1907, 〈台灣言語分布圖〉載《日台大辭典》，台灣總督府。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書局。

李壬癸

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事業出版。

1999, 《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2004, 〈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尙義教授〉，初版刊《國語日報・書和人》第1004期 (2004, 5/22)。

2004, 〈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繪製。

洪惟仁

柳田國男

1930，《蝸牛考》，刀江書院。

洪惟仁

1992，《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1995，〈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台北：國立師範大學《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pp.119~158。1997，《高雄縣閩南語方言》，高雄：高雄縣政府。

2002，〈台灣の漢語方言地理學〉，收入馬瀨良雄監修、佐藤亮一、小林隆、大西拓一郎合編《方言地理學の課題》pp. 127-137，東京：明治書院。

2003，《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2006，〈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365-416。

2009, 7/4，〈台灣の言語地理学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地域言語》21:11-33。

2010. 〈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敲開語言的窗口：華語的使用現象（情況與調查）》，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語言暨應用語言學系學術論文系列(二)，聯營出版(馬)有限公司出版。

柴田武

1969，《言語地理学の方法》，筑摩書房。

馬淵東一

1954，〈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民族學研究》18.1-2:123-154, 18.4:23- 72。

馬瀨良雄

1993，《言語地理學研究》，東京：櫻楓社。

涂文欽

2009，《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其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曹志耘

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項夢冰、曹暉

2005，《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M. J.)

1978，《言語類型地理學》，東京：弘文堂。

1981，《現代博言學》，東京：大修館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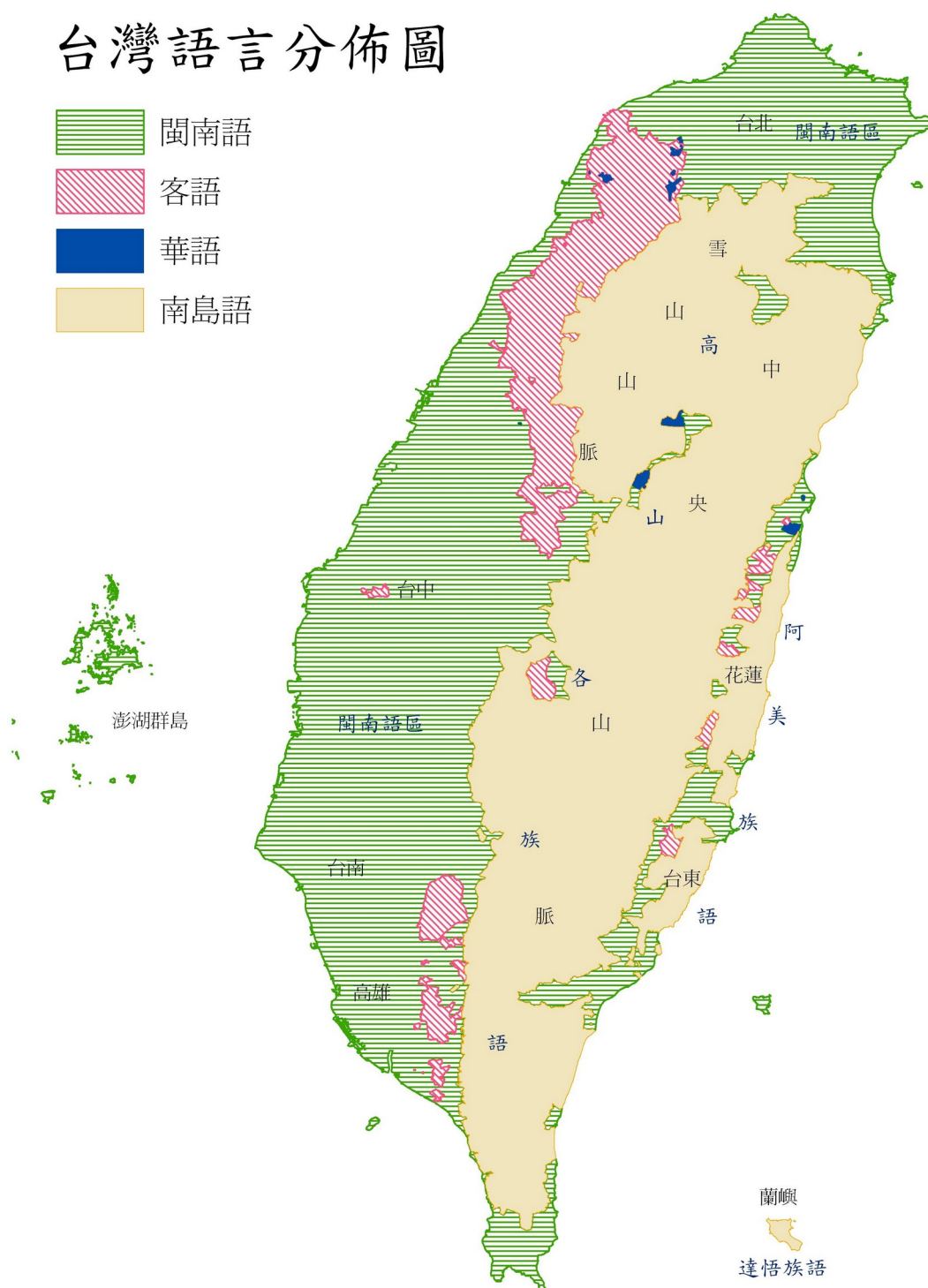
臺北帝國大學言語研究室（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合著）

1935，《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東京：刀江書院。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合著）

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共二冊），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東京・刀江書局出版。1996，台北：南天書局影印二刷。

【附圖 8】〈台灣語言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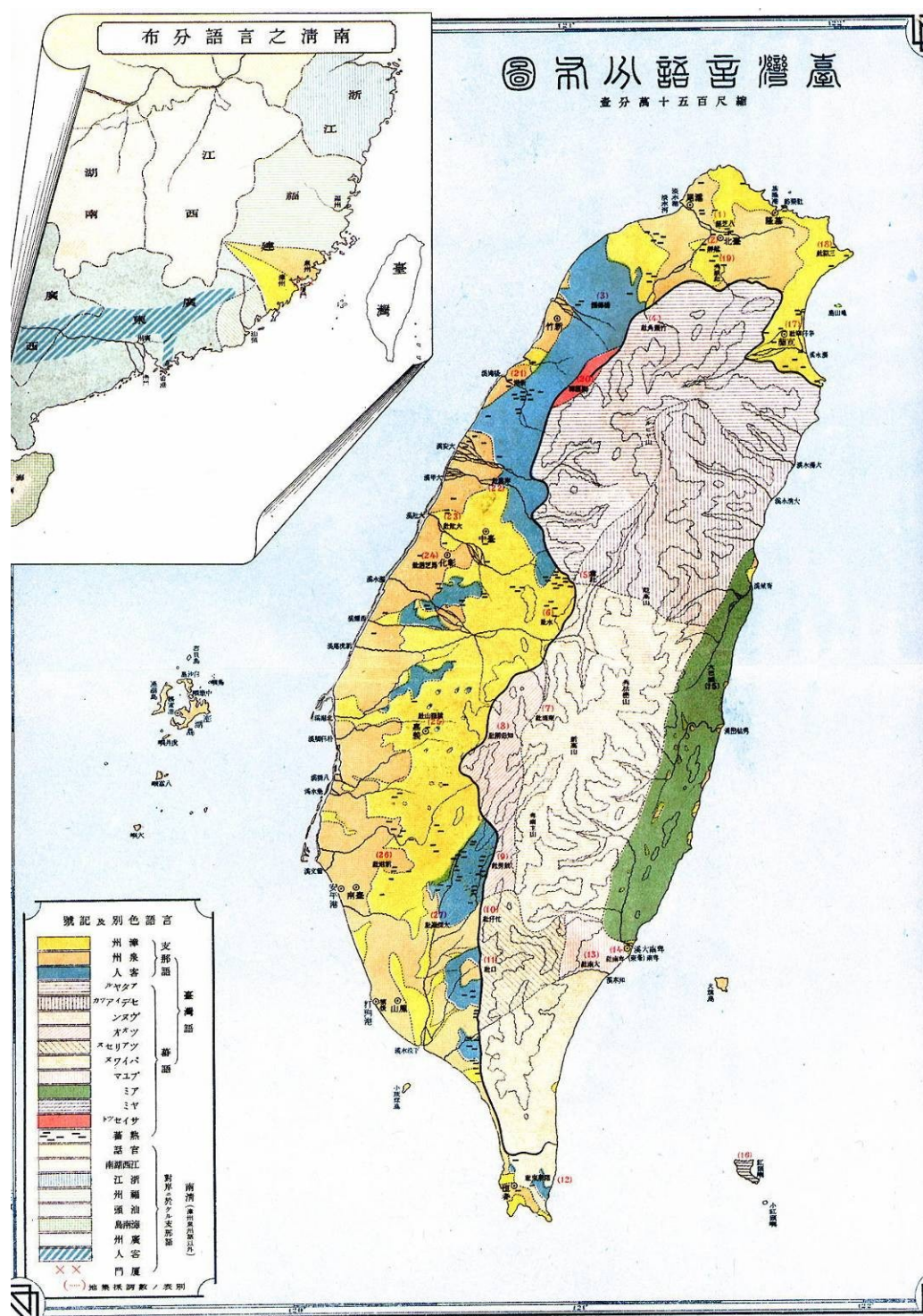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洪惟仁繪製。

【附圖 9】「乾隆初葉番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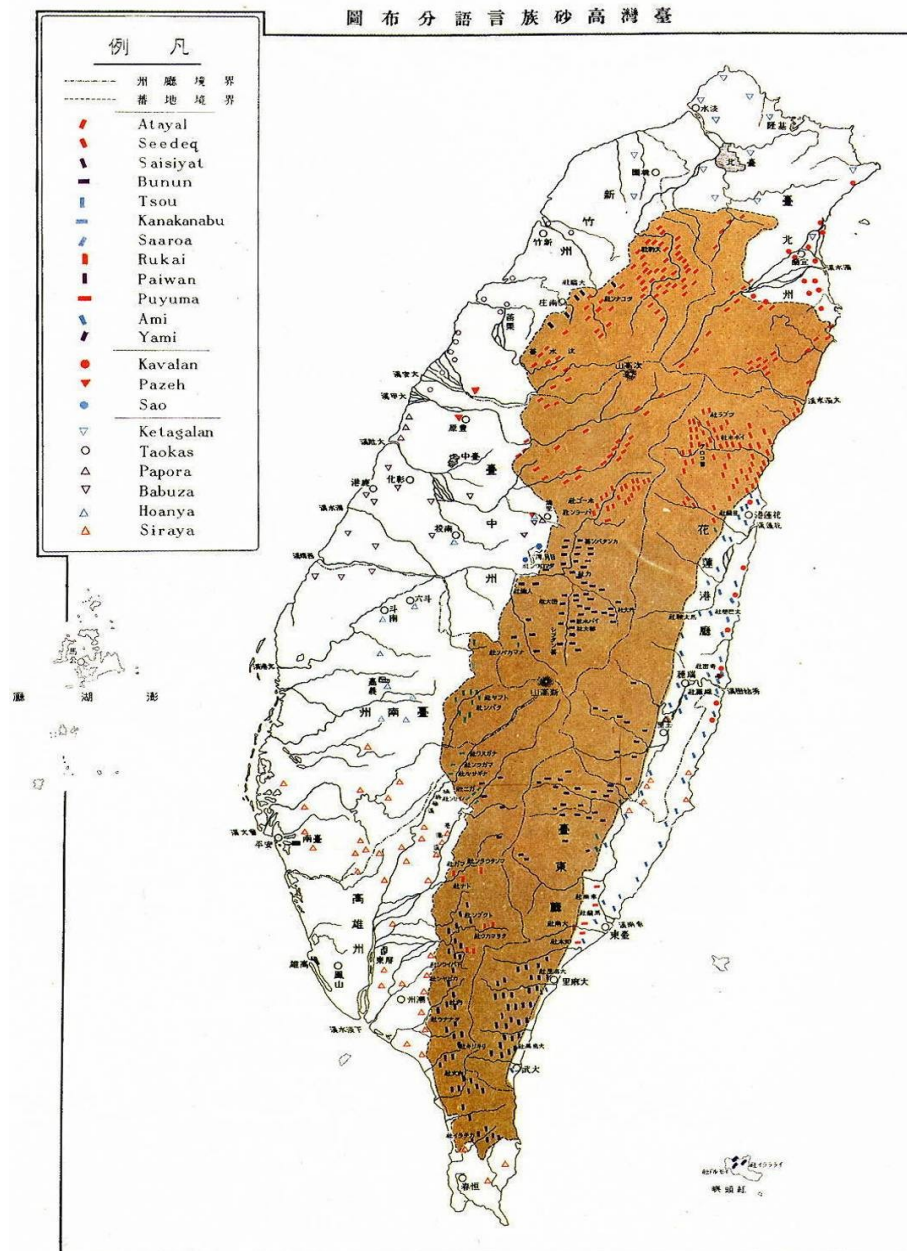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根據柯志明 2001 重繪，地圖為台灣現代語言分佈大勢

【附圖 10】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日大辭典》（1907）所載

【附圖 11】〈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



資料來源：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所載附圖。